

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 批判理论研究

——以魏玛写作为中心

林雅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 批判理论研究

——以魏玛写作为中心

林雅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拉考尔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以魏玛写作为中心 / 林雅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161-8863-7

I. ①克… II. ①林…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34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14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就国内学界而言，对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作品的关注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逐步开始的。与布洛赫或本雅明的作品在同时代引发的再解读热潮相比，人们对克拉考尔这位魏玛时代极为活跃的思想家的关注则显得十分有限。基于他后期的两部恢宏著作——《电影理论》（*Theorie des Films. Die Errettung der äußeren Wirklichkeit*，中译名为《电影的本性》）和《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Eine psychologisch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ilms*），学界大都仅将克拉考尔视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或者一个电影批评家。而实际上，克拉考尔在流亡美国之前，尤其是在德国魏玛时期所写下的诸多作品，却很少为人所知，甚至在德国也曾一度被人遗忘；正是这种未知与遗忘造成了学界对克拉考尔的狭隘理解。此外，克拉考尔对批判理论的贡献，尤其是他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大众文化理论的贡献也几乎在这种未知和遗忘中被掩埋进了历史的尘埃。

我们知道，魏玛时期是德国思想史上最为激荡的年代之一。在政治上，它处于一战溃败到民主制度创立，以及不久之后纳粹崛起的交界点上。在文化上，它又是一个极为混杂繁荣的时期，表现主义、相对主义、宗教复兴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各种思潮交织缠绕。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语境中，尤其能对德国现代性危机的诸种态势进行切近的观察。克拉考尔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自然经历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颠沛遭际：一战硝烟、魏玛共和、纳粹上台，流亡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欧洲复归等。不过，克拉考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魏玛时期所进行的文化批判、现代性批判，

并非借靠任何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立足于一个现实具体的社会化平台。当时，他供职于一份极富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这份报纸曾被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1894—1939）^①称作“一个德国的缩影”，认为它真实而深刻地勾画出了那个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德国。这份报纸的副刊（Feuilleton）部门，是其作为时代先锋的搏动心脏。在诞生之初，它还只是一个纯文学论坛。不过，随着一战的风云变幻以及整个欧洲局势的动荡，它迅速转变成了一个探查德国以及欧洲社会文化的主阵地。如果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它变成了一个堆砌着符号文字的仓库，通过这些文字符号，我们就能判断并且解读出这一时代精神的历史状貌。借助这一平台，克拉考尔深入到了魏玛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挥动笔杆，针砭时弊，写下了数千篇的评论文章。这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深虑与识断，更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胆略和洞见。在当时的德国思想文化界，克拉考尔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知识人，他虽然没有真正加入法兰克福学派，却对其主要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从1918年开始，就成为了阿多诺的老师，指导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进行阅读。他与本雅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以及布洛赫之间的关系都极为密切。除此之外，他还与当时的宗教改革团体——犹太教拉比纳米亚·诺贝尔（Nehemia A. Nobel，1871—1922）的小圈子（其中包括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马克斯·舍勒、弗兰茨·罗森茨威格等人）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他的身份是多元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性，让他身处魏玛现代性的思想洪流之中，成为勾连各种文化思潮、社会思潮的重要关节点。

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学界开始了对克拉考尔的理论资源的发掘，力图重建其应有的学术地位，焕发其在当下的理论生命力。这一新的学术热点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克拉考尔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克拉考尔生前未出版的大量原始

^① 约瑟夫·罗特，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新闻工作者，重要作品包括 *Radetzky March*（1932）、*Juden auf Wanderschaf*（1927）等，1921年之后开始在《法兰克福报》担任编辑，成为克拉考尔的同事。

文献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一股克拉考尔再发现的热潮开始迅速发酵。在此后的十多年间，随着各种学术研究成果的相继推出，克拉考尔极富特色的现代性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面貌也逐渐得以清晰。2008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克拉考尔研讨会，进一步推进了学界对克拉考尔思想的研究和接受。此外，克拉考尔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呈现的强大阐释能力，亦在不断得到学界的重新发现与认可。到目前为止，克拉考尔已经成为西方电影史、西方美学史以及西方文论史当中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克拉考尔的作品也已经被列为文化研究的精选篇目和参考资料。不过，在汉语学界，除了1981年邵牧君先生翻译的《电影的本性》以及2008年黎静女士翻译的《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之外，克拉考尔的其他作品都尚未被翻译成中文，探讨克拉考尔思想理论的文章更是十分稀少。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1984年郑雪来发表于《电影评介》第三期上的《电影本性探讨》是国内期刊中首篇介绍克拉考尔电影理论的论文。随后伍菡卿翻译了P. 尤列涅夫——《克拉考尔和他的〈电影的本性〉》；杨剑明在1989年发表了《论纪实性是电影特性美学进程的逻辑结果——兼论巴赞、克拉考尔的电影观》。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重要的几篇深入研究克拉考尔电影理论的文章有：2002年胡星亮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的《克拉考尔电影理论二提议》、2008年肖骁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的《重回克拉考尔——初探克拉考尔之现象学倾向》、2009年徐枫的《历史写作：见证、思想、方法论与文献——读〈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以及2009年肖平的《“我要给自己划定范围”——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自序新论》。但是，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克拉考尔的认识仅限于电影理论，所依据的材料也仅仅是《电影的本性》这一中文译本，没有涉及克拉考尔其他方面的理论成就。如果说，对这一研究态势有一定突破的，就是2003年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被译成汉语出版。自此，一个长期被电影理论家头衔所遮蔽的、作为现代性文化批评家的克拉考尔得以浮出水面。2011年笔者的博士论文《作为理性批

判的文化批判——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写作》是对克拉考尔文化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首次系统研究。在此之后，李政亮的《柏林文化状况中的克拉考尔》、2012年傅海勤的《克拉考尔的“现代人”观念研究》，以及2015年车致新的《“散心”的审美政治学——从克拉考尔到本雅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内学界对克拉考尔研究的深度。

应该说，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写作，尤其是对现代性危机的考察，对现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批判，对于理解他的整个知识分子存在及其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本人在其晚期的历史哲学著作中，也一再提醒我们关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不了解他在这一阶段的写作，就无从解读他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电影理论家或者电影史家，更是对他思想的严重误读。因此，为了还原克拉考尔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全面系统地考察克拉考尔的思想体系，就必须将他在魏玛共和国的写作视为重中之重，必须对他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图景、主题以及写作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具体观之，他在魏玛时期的写作题材十分庞杂——书评、影评、学术会议报告，甚至还包括对各种文化议题所展开的批评论争。面对这些包罗万象、灵动活泼的时代主题，克拉考尔采用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解读模式：从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现象，一些稍纵即逝、无关宏旨的大众文化现象入手（诸如交际舞蹈、旅游运动、畅销书籍、建筑风格等），展开社会批判和哲学分析，并由此揭示出其背后所隐藏的未被扭曲的真理性内涵。这恰恰是此后风靡学界的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克拉考尔文化现代性理论颇具当代意义与现实关怀的根由所在。

约瑟夫·罗特曾给《法兰克福报》的副刊主编本罗·莱芬贝格^①（Benno Reifenberg, 1892—1970）写过这么一封信：

克拉考尔逻辑清晰，根基扎实，批判尖锐入骨。他从空气

^① 本罗·莱芬贝格，1964年曾经获得歌德奖（Goethepreis der Stadt Frankfurt）。这是一项至高荣誉的德国文学奖（并不限于作家），以德国作家歌德命名。最初为一年一度颁奖，但后来改为三年一度。

中抓出的一个抽象事物，一经他的手马上变得栩栩如生。克拉考尔是一个运用新闻体裁的哲学诗人。^①

这段话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克拉考尔写作的基本特点——对于现实世界的精微捕捉和生动呈现。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揭示了克拉考尔“表面化写作”内在的哲学性。在克拉考尔看来，“真理内容”只有借助对表面的“实在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和把握才能最终获取。因此，他早期写作的主要立足点，就是将观念和感觉的焦点放置在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未知领域”(unbekanntes Gebiet)^②和日常生活的“表面现象”(Oberflächenäußerungen)^③之上。

正如克拉考尔在《大众装饰》(1927)一文的著名开场词所言：

要确立一个时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分析其不起眼的表面现象比那个时代的自我评价要可靠得多。^④

1930年，克拉考尔将这一分析视角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界定，他说：

整个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图景就像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梦境，在任何一个空间的象形符码被破译的地方，就是彻底显露社会真相的地方。^⑤

可以说，克拉考尔这种破译社会文化密码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现象学的还原法，即着力考察“表面现象”之下藏匿的真

① Ingrid Belke/ Irina Renz, *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 Marbach am Neckar: 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1988, S. 43.

② 这一“未知领域”，实际上指的是以陌生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的熟识世界。

③ 这是克拉考尔的重要学术概念，意指在魏玛现代化进程当中，忠实反映资本主义合理化生产模式，被掏空了具体性内涵的文化现象。克拉考尔认为，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隐匿在其背后的真理线索。

④ Siegfried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in: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7, S. 50.

⑤ Siegfried Kracauer, “Über Arbeitsnachweise 1930”, in: *Strassen in Berlin und anderswo*,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64, S. 12.

实本质。当然，在魏玛时代的德国，这些隐没于日常生活中的“未知领域”或者“表面现象”其实是伴随着现代都市出现后的产物，而现代都市恰恰是体验现代性的极佳场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克拉考尔的早期写作之中，他的探索足迹几乎覆盖了魏玛共和国大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街道、轻歌剧、公园、侦探小说、职业介绍所……在他的笔下，社会中不同阶层间的微妙联系和对立，各种日常生活夹缝中的隐秘文化现象，都变成了剖析魏玛现代性的尖锐武器，让我们能够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文化碎片中洞察现代世界的真相。

当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与文化工业理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文化运作的内部秘密昭然若揭；伯明翰学派使得日常生活研究成了一个完全具备合法性的学术领域；罗兰·巴特也已经运用后结构主义将日常生活进行了“神话学”的充分解读。我们对文化研究的各种套路早已了然于心，甚至其分析阐释模式也已经内化到了我们的思维结构之中。因此，当我们回头再看克拉考尔的魏玛作品，就会惊叹，他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以及罗兰·巴特的理论产生之前的几十年间就已经展开了如此具有启发意义的批判实践。也就是说，早在文化现代性批判、大众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研究范式之前，克拉考尔就已经开风气之先，对其价值进行了充分的高扬。他认为，在魏玛时代的文化碎片之中包孕着整体救赎的思想意涵。通过对微观现实和各种“表面现象”的洞察，可以重新挖掘出一个隐匿在碎片化历史中的真实空间。这种对于现代大众文化的批判性潜能具有前瞻性的深刻阐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试图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克拉考尔魏玛时期作品的内涵，从而系统性地还原其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面貌。

从根本上来说，克拉考尔对魏玛时代那些短暂、单子化、非体系性的大众文化“表面现象”的分析，是为了找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综观其魏玛时期的写作，我们发现，他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在其作品中不断出现的现代性困境之问题。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是一个理性化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这一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失落、耗损严重的过程。面对这一现代性状况，克拉考尔并没

有完全采用或者认同韦伯的“世界祛魅”说，或者西美尔的“文化悲剧论”等解释框架，而想要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道路。他深知，祛魅后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思想的真空，在这令人恐惧的思想真空中，隐含着两种可怕的风险，其一就是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复归蒙昧化”；其二就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再度神话化”（Remythologisierung）。因此，他将问题的关键转移到了如何在这个已经失落了形而上信仰体系，面临着理性瓦解的异化、碎片化的世界中，重新构筑起充满意义的模式上来。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数量庞大的写作，甚至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写作几乎都服务于这一意图。这是魏玛现代性投射在克拉考尔思想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

魏玛现代性是一个建立在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废墟之上又缝合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产物。在这个时代中各种思潮涌动混杂，构成了热闹非凡同时又动荡不安的时代景象。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克拉考尔的思想得以孕育与发展。在克拉考尔看来，魏玛时代的人群被困在一个无法实现自身个性本质的体系之中。一方面，原有的宗教信仰大厦已经倾覆，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继续支持人的价值与追求。为了得到精神的安顿，各种新型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给出了多种救赎之可能，但是，克拉考尔认为，这些宗教复兴运动所带来的却是一种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彻底颠覆理性的历史成果，将人类重新带回蒙昧世界的危险。可以说，正是对传统、信仰、族群的畸形强调，才导致德国在二战之中跌入了反理性的深渊。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对各种政治、文化弥赛亚主义的犀利批判，极富前瞻性地预见了此种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工业救赎，又因其对抽象性与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忽视了人的本质存在，甚至将抽离了具体内涵的僵化理性送上了神坛，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崭新神话”。不过，与当时多数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论者（例如阿多诺）不同，克拉考尔对资本主义抱持着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在他看来，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非人性与异化现象的并非理性本身，而是丧失了具体性内涵的僵化的理性——也就是抽象性。因此，克拉考尔认为，对资本主义理性的批判，并非对理性的全盘否定，或是对“去神话化”（Entmy-

thologisierung)^① 历史成果的背弃，而应该抓住其根本性的缺陷——作为资本主义理性主要特征的抽象性。抽象性是启蒙理性战胜自然力之后的自我僵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确立，抽象的形式主义、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这就使得理性内部原有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力量逐渐耗散，从而导致了理性的僵化，乃至成为一种空虚而没有内在意义的形式。它要求将一切的具体性，或者说特殊性转化为平面化、可计算的普遍性。意即，资本主义社会用“错误的抽象性”取代了神话时代“错误的具体性”^②。然而，矛盾的是，取得胜利的抽象性，却承继了神话的特点，将历史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视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那些被打败的自然暴力、自然神话以另外一种绝对性的方式在抽象理性的内部得以重生——这就是新的理性神话的诞生，也就是克拉考尔所说的“再度神话化”（Remythologisierung）。故而，克拉考尔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去神话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完结，启蒙理性的解放性力量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像他在《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中所言，资本主义时代“并不是理性化过头了，而是压根没有足够理性化”^③。在魏玛现代性困境中，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继续推进理性的向前发展？如果不能洞穿资本主义理性的本质缺陷，对其进行彻底变革，那么，理性就将永远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换言之，只有破除资本主义抽象性的新“神话”，才能释放出理性的真实力量。与抽象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就是对真实现象的具体观察，对实际内容的具体把握。因此，克拉考尔将目光投向了魏玛时代的大众文化——那些被抽象性所遮蔽的世俗生活的具体而直观的表达。他期望通过对其进行的批判性解读，与空虚的抽象性对抗，从而释放出资本主义

① 克拉考尔在其早期作品中，将现代性历史看作是对先前“意义充盈”时代的背离。而在唯物主义转向之后，他将其视为一个“祛魅”（Entzauberung）的过程，一个去统一性、去实体化的过程。在他的重要作品《大众装饰》中，克拉考尔将此过程描述为“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

② Siegfried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in: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Verlag, 1977, S. 57.

③ Ebenda.

生产关系背后的革命性潜能。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时代才能终结于自身之手，真理性的意义才能最终得以显现。就此而言，克拉考尔认为，在意义空虚的现代世界中，绝不能出于对救赎的渴盼，就放弃启蒙理性的历史成果，遁入历史的前现代空间，重新捡起那些带着自然化色彩的“神话”之石；而应当充分地挖掘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大众文化“表面现象”背后的革命性潜能，以期带领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探寻久被压抑的时代真理。

值得关注的是，克拉考尔对魏玛现代性危机所展开的理性批判、文化批判，就我们当前所处的后现代语境以及危机重重的全球化时代而言，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托马斯·列文在《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英文版的导言中，就提到了克拉考尔魏玛作品中的这种令人“震惊的当下性”，他说：

1993—1994 年之间的柏林正是这种当下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个“精神上无家可归者”的中心地带，一个统一的德国重新复苏。令人惊讶的是，克拉考尔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法兰克福报》上所写的文章，竟然再度出现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报上。正是这种重现，令人惊讶地证明了由于现代性危机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在当下这一后现代语境中并没有完全消失。^①

确实如此，在魏玛共和国落幕 80 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依旧陷落在意义空虚的现代性危机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造就的文化景观愈加光影迷离，技术进步的速度更是大大超越了人所能预期和掌控的范围；另一方面，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意义的焦灼与渴盼，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愈演愈烈。各种各样的救赎性承诺，亦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中轮番上阵。不过，他们仍旧无法真正触及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并给出疗救的良方。如何重获意义，如何探

^① Thomas Y. Levin, "The introduction", in: Siegfried Kracauer,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ed. and trans. Thomas Y. Lev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

寻时代的真理，依旧这个世界不变的主题。因而，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所提供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就我们当下而言，仍旧具有可资参考的价值。

太阳底下无新事，对于意义的探寻，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跨越的核心问题。

目 录

导论 一个被遮蔽的思考者 ——克拉考尔	(1)
第一章 克拉考尔与魏玛现代性困境	(12)
第一节 克拉考尔的早期写作——现代性体验之发端	(12)
第二节 虚空中的迷狂——魏玛现代性的形成	(15)
一 先天不足的魏玛民主	(16)
二 失控的通货膨胀	(18)
三 黄金时代? ——魏玛文化	(20)
第三节 克拉考尔的现代性诊断——以《等待者》为例	(22)
一 一个意义丧失的时代	(24)
二 《等待者》(Die Wartenden)	(29)
第二章 从弥赛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39)
第一节 纳米亚·诺贝尔团体的弥赛亚主义	(41)
一 《天主教与相对主义》	(47)
二 《旧约·圣经》翻译	(53)
三 布洛赫与克拉考尔之争	(66)
第二节 克拉考尔的唯物主义转向	(72)
一 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视角	(73)
二 “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 的 双重内涵	(78)

第三章 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	(85)
第一节 《侦探小说》，一个哲学文本	(86)
一 酒店大堂，现代性的“表面现象”	(88)
二 侦探，理性的绝对化	(95)
第二节 通往未知领域——《职员》	(100)
一 职员阶层的兴起与幻灭	(102)
二 职员——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产物	(107)
三 经济的无产阶级化与文化的资产阶级化	(113)
第四章 物质救赎意义	
——克拉考尔的大众文化批判	(124)
第一节 为大众文化正名	(125)
第二节 大众文化：社会无意识的“表面现象”	(131)
一 电影	(132)
二 踢乐女孩（Tiller Girls）	(138)
第三节 大众文化：空虚时代的救赎力量	(144)
一 大众文化的双重内涵	(144)
二 大众文化的救赎之旅	(149)
第五章 未完结的问题	
——克拉考尔作品的开放性	(166)
第一节 尚在途中——关于意义的找寻	(166)
第二节 《好奇的现实主义者》——与阿多诺之论争	(171)
结 语	(188)
附录 克拉考尔年表	(193)
参考文献	(203)
后 记	(216)

导 论

一个被遮蔽的思考者

——克拉考尔

作为德国魏玛时期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克拉考尔对魏玛现代性所进行的深刻而独到的文化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先河。其融合了哲学、美学以及丰富文学表现力的文风，曾在魏玛时期引发了一股克拉考尔热潮。1964年，作为克拉考尔多年好朋友的阿多诺，将其称为一个“好奇的现实主义者”（The Curious Realist），说他“带着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来思考，刹那间就能照亮周围的一切”。^①阿多诺的这个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克拉考尔写作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借助陌生化的视角，对现代世界中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与探究，进而挖掘并重现其深层次的意义内涵。克拉考尔在其晚年的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终结之前》（*Geschichte-Vor den letzten Dingen*）^②的前言中，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关心的问题：

我此生所写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好像内在并无什么连续性，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意图：那就是对那些至今尚未被人所知，而遭受忽视或者错误

^① Theodor W. Adorno, “The Curious Realist: On Siegfried Kracauer,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i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4, 1991, p. 159.

^② 这部作品在克拉考尔生前并未出版，是其遗孀伊丽莎白·克拉考尔在其去世之后与历史学家保罗·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编辑出版的。当时是用英文写作，后来被翻译成德文，其英文标题是 *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判断的对象和存在模式进行复原。^①

当克拉考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写下以上那段话的时候，能够理解这些话的读者已经不再存在——并且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产生过能够理解他的新读者群。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评价不过是一个“迂腐”、“幼稚”的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家。这一定位根本无法全面反映其思想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那么，学界为何会对克拉考尔产生此种误读，而克拉考尔的被“遮蔽”究竟又缘于何处？

从一个方面来说，学界对克拉考尔的误读，来源于对其魏玛时期作品的忽视。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Duddley Andrew）曾在《经典电影理论导论》（*The Major Film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将克拉考尔和法国纪实电影大师巴赞进行过一番对比：

克拉考尔径直走进了图书馆，并且把自己封闭于真实的电影生产和电影批评之外，非常细致并且认真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克拉考尔不同，巴赞总是与那些进行电影创作或者进行电影批评的人在一起。^②

显然，安德鲁十分赞赏巴赞充满活力和实践色彩的电影理论研究方法，却并不欣赏克拉考尔构建电影理论体系的封闭性与形式感，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电影理论家。不过，他对克拉考尔的这种评价却是失偏颇的。其原因在于，他并没有将克拉考尔的早期作品，尤其是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作品纳入研究的范畴。实际上，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创作充满了安德鲁在巴赞

① Siegfried Kracauer, *Histor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

② Duddley Andrew, *The Major Film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35.